

包筠雅著，劉永華等譯，《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512頁。

四堡位於閩西山區，在地理、文化、經濟、政治上均處於「邊緣中的邊緣」，何以在17世紀後期至20世紀早期長達兩個半世紀裡，成為華南地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出版物行銷福建、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10省？四堡出版業的生產流程、組織結構、貿易網絡及其出版物有何特色之處？更重要的是，與明代坊刻貿易集中化的狀況相比，類似四堡的次一級出版中心興起，體現了清代印刷文化的什麼趨勢？出版物遠銷鄉村內地和邊疆地區，給書籍文化在地理和社會層面在晚期帝國社會的擴散造成何種影響？美國布朗大學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教授的《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一書，主要處理帝國晚期鄉村底層的圖書出版與銷售活動的問題，以書籍出版的社會文化史為切入角度，主要依靠出版遺存、族譜、書坊賬本等文書及口述資料，通過對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書籍出版史細緻而深入的研究，為理解上述問題提供了助益。

全書共14章，除第一章導論外，分上、下兩部。上部「四堡的圖書出版業和銷售業」包括第二至八章：第二章概述了閩西與四堡的地理、文化及社會經濟狀況，指出當地既貧窮又偏僻，處於客家核心區，是閩贛粵邊區的一部份，四堡出版商及經銷商主要來自馬屋和霧閣的馬氏、鄒氏宗族。第三章討論了四堡出版業的起源和書籍生產的過程。作者認為，四堡出版業自17世紀中葉逐步興起，乾隆、嘉慶年間是四堡印刷業的黃金時代，在19世紀中葉初露衰落的端倪，伴隨着印刷技術革新及科舉制度廢除，四堡出版業逐步走向衰亡。四堡的自然資源及家庭組織支持了該地區出版業的發展。在第四、第五兩章中，作者討論了四堡「總部」書坊的結構和管理，揭示出書坊是作為宗族內的家庭產業，分家在抵制單個書坊壯大的同時刺激了新書坊的不斷建立，發展了一套處理族內和族際關係的慣例。在第六、第七兩章中，作者轉向考察書業的貿易網絡。四堡出版商足跡遍及福建、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10省，避開都會和商業中心，主要向鄉村內地和邊疆地區滲透，體現了清代印刷文化空間擴散的深度和廣度。第八章分析了書商在商業活動中的思想觀念和自我認知，並探討了四堡書商在地方和區域社會及帝國晚期經濟中的地位。

題為「四堡刻本」的下部包括第九至14章：第九章主要分析四堡出版商

刊印和銷售的書籍的範圍和來源。作者指出，四堡出版商選擇出版「確鑿無疑的暢銷書」（頁217），包括蒙學、雜字、幼學輔導教材、文範、詩選及詩賦指南、四書五經等教育類書籍，實用類書和日常生活禮儀指南、醫學與藥物手冊、通書、風水書、占卜手冊、善書等指南類書籍，小說、戲曲、歌冊、詩集、書畫集等文學類書籍，四堡出版商本身也編纂和編輯圖書。作者在第10至12章中將四堡出版物分為教育類、指南類、文學類三種，對這些書籍的內容和版面進行分析。第13章是下部的結論。作者先是討論了四堡坊刻本的價格和受眾，指出這些出版物一般都是廉價的「暢銷書」，四堡的出版「以充其量由小康之家構成的口味不挑剔的受眾為目標」，「並不為一小群精英刊刻精美的文本、高深的學術著作或典雅的文藝作品」。（頁367）作者進一步「把四堡的坊刻本看作一種大眾文本文化的組成部份」，考察「它們在帝國晚期社會中的功用和地位」。在第14章中，作者指出，四堡印刷出版史印證了導論中所提出的清代印刷文化的總體歷史趨勢，即「雕版印刷和書籍文化在地理上向外擴散至華南腹地，在社會層面向下滲入教育程度最低的階層」。（頁375）最後，作者還討論了這種文本文化的擴散與當時人們的識字能力、社會文化整合及社會階層流動的關係。下部的討論，除了對坊刻本受眾的分析相對薄弱外（劉永華，〈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評介〉，《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頁186-187），也未能充份利用目錄書和出版物纂者及編輯者的傳記資料。舉例而言，面對四堡殘本《文料大成》一書，作者僅依據現存的四卷對該書的卷數、內容、目的展開分析，稱「全書至少有二十五卷」，「看起來是一種更為詳實的百科全書」，「以通行的文化分類來組織知識，強調倫理價值觀」（頁250），導致訊息缺漏及錯誤推測。實際上，《文料大成》一書有多種完本存世。作者所據四堡殘本原應是光緒五年（1879）刻本，40卷，類分850條，「上澣冷香子」撰。根據書前序言，該書為類書，是舉業輔助讀物，封面有「便於舟車攜覽，幸勿誤帶入場」字樣（何遠景主編，《內蒙古自治區線裝古籍聯合目錄》，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4，頁991）。《文料大成》一書在清末是頗受歡迎的舉業輔助讀物，除了四十卷本，還有多種刊刻於光緒年間的四卷本。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在材料搜集上花了很大功夫。除了方志、文集和筆記，包筠雅在田野考察中還搜集了族譜、書坊分關、書目清單、賬本、交易文書、典當契約、四堡出版物及其他出版遺存等大量原始資料，並做了一百三十多次訪談（頁15-21），這在中國出版史研究中是很難得的，藉此也才能

夠對四堡印刷出版史作細緻而深入的研究。舉例而言，現時關於明清書籍售價的討論，主要數據來源於書籍木記、書目題跋與筆記，材料不易獲得且零碎。（參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載氏著，《書韻悠悠一脈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94-112；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56；袁逸，〈清代的書籍交易及書價考〉，《四川圖書館學報》，1992年，第1期，頁71-80。黃永年曾發現一頁有「狀元閣爵記印」六字的售書廣告，上面開列了109種書冊名目及其售價，見黃永年，〈介紹一個世紀前的童蒙讀物〉，《陝西師大學報》，1997年，第4期，頁162-163）包筠雅在四堡坊刻本價格的討論中，則是用了兩種賬本：一種是文海樓的書賬，列有379種書籍的批發價；一種是某流動書販三位成員所記書賬，列有該書坊所售圖書的零售價（兩種賬本都沒有標明年份，作者認為文海樓書賬提供的只是出版業最後幾年、最早是20世紀頭10年的情況，而流動書販三位成員俱生活於19世紀後期、民國初期，可見此兩種賬本反映了清末民初書籍價格的狀況）。賬本提供了關於書籍售價的大量數據，且相對集中，為四堡坊刻本價格、受眾及其反映的清代大眾文本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的社會文化史取向充份體現了近期書籍史研究的明顯趨勢。作者在關於四堡圖書銷售業的結構與組織、清代文本文化擴散與識字率、文化整合諸問題的研究中，很好地體現這種社會文化史取向，避免了僅從印刷技術史的角度展開分析，拓寬和深化了問題意識（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周紹明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井上進著，李俄憲譯，《中國出版文化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本書的局限之一是較為缺乏對四堡坊刻本來源的分析。雖然書中第九章提及四堡坊刻本除了挪用文本、交換和購買書版之外，鄒氏、馬氏也親力撰寫或編纂圖書（頁220），卻沒有進一步展開討論。比如說，四堡坊刻本與福建地方學術文化傳統、資源有何關聯？明代福建文風興盛，不乏科名顯赫且在朝佔據高位者，這些人的制舉之書受到建陽書商熱捧，甚而為了射利，

書賈不惜做偽，將許多商業出版物托名於這些名人之下，這種狀況在四堡書商和坊刻本那裡有沒有類似的狀況？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

書中還存在一些可加以改正的史實訛誤，對現有研究成果的參考也可以做得更好。如第251頁腳注1稱「李廷機（?-1616）」，「是萬曆十一年（1583）的狀元」，李廷機事實上生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為萬曆十一年會元、榜眼，而非狀元。同頁提及《大方綱鑒》一書，言「相傳這本書是袁黃（1533-1606）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所作，現存殘本的封面上有『新刊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鑒補』字樣」。文獻目錄學家王重民在其代表作中早已指出，此本（掛名袁黃本）為建陽書商余象斗第三刻。第一刻托名李廷機，第二刻又改吉澄校刻本（此本也有在第一刻之前之可能），第三刻又全翻第一刻而改托袁黃。「余象斗自萬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十年之間，三刻是書，三次更換名目，無非欺騙讀者，冀多銷售耳」（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98-99）。

林孝傑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貴志俊彥、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〇世紀滿洲歷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840頁。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積極對外發展大陸政策的同時，更對「滿洲」的各項情勢頗為關注。自19世紀末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日本與滿洲之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在此期間，配合軍事擴張和侵略的需求，為數不少日本各領域的學者從事與滿洲歷史、社會性質相關的研究，也留下了許多實證研究成果。然而，戰後日本在復興國內社會、走向國際外交的過程之中，原來曾有過「滿洲經驗」的當事者，卻沒有主動提及自己在滿洲時期形形色色之生活。更確切地說，隨着「戰爭陰影」影響，戰後日本基層社會對討論滿洲可謂是一種禁忌。情況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亦即主要的當事人日益凋零之後，才逐漸有所改變。

1970年代以後，日本的滿洲研究大部份集中於日本殖民地史範圍內，多半檢討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或者表彰「殖民現代化」成果，包括日本民眾對